

钱锺书评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钱锺书评论

卷一

范旭仑
李洪岩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蒙沈恒炎先生、陆象淦先生、叶桂生先生帮助,特此志谢。

钱锺书评论 卷一

范旭仑 李洪岩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125 印张 250 千字
印数:0001—5000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50-1/C·78 定价:17.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梦熊	富寿荪所存钱札四通	1
林子清	钱先生两封复信的说明	6
郑士生	钱先生杨先生与《莎士比亚辞典》	10
张文江	钱先生的又一封信	13
纪健生	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父子	15
汤 晏	钱鍾书访哥大侧记	22
钮先铭	记钱鍾书夫妇	26
林耀椿	钱鍾书在台湾演讲	30
毕务芳	《石语》：钱鍾书与陈衍	44
李洪岩	钱鍾书与陈寅恪	62
张明亮	从莎菲说到贾宝玉再说到方鸿渐	100
范明辉	《围城》疏证续三	122
罗新璋	钱鍾书的译艺谈	144

宋秀丽	钱鍾书对历史的理解	169
张文江	《管锥编·太平广记》读解	179
赵玉山	《槐聚诗存》勘误	207
汪少华	《管锥编》校读记	222
蔡 军	正钱录	240
白克明	评论钱鍾书一甲子	246
傅聚卿	有关钱鍾书书简明目录	268
爱 默	钱鍾书旧居要不要拆	285
牟晓朋	《记钱鍾书先生》出版后记	289
罗 厚	钱鍾书书札书钞续二	293
王 璐	钱鍾书传记文献引得续编	313
章学良	钱基厚的《孙庵年谱》	317
范旭仑	杨荫杭《申报》文史札记目录	341
	致读者	350

陈梦熊

富寿荪所存钱札四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富寿荪先生著席久可
高名鼎鼎修德为怀思奉周雅翁

惠赐算枝清诗读之
文雅炳周之燭物重而

意更爱拜厥威德藉一披最见勘

订密教指语皆括眼明以丹心細书

絲湖明心清淨精微三儒尤你

仙何事此道謝服叩

中
陸敬士 廿日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富寿荪，字漱霞，一九二三年一月三日生于浙江海盐县。五十年代进入出版社，整理古籍，完成《唐诗纪事》、《范石湖诗集》、《唐诗别裁集》、《清诗话续编》的校点，并选注《千首唐人绝句》、《清词菁华》等，另有唐诗考证及评论文章百数十篇。富君尤向往于旧体诗词创作，先后求教于辛心禅、龙榆生、叶葱奇和王遽常诸老。他尤钦慕钱鍾书先生的学问，先以所校《清诗话续编》寄呈钱先生，后以诗作寄请钱先生审定。富君去世后，家属以其所得钱先生书札七通见示，读后甚使我感动，兹征得家属同意，特将其中四通刊布。

(一)

寿荪先生著席：久耳

高名，无缘晤接为恨。忽奉周振翁转来

惠赐尊校《清诗话续编》，馈贫之粮，炳暗之烛，物重而

意更殷，拜领感愧。稍一披寻，见勘订密致，按语简括；眼明如月，心细于丝，渊明所谓洁净精微之儒。尤深倾倒。专此道谢，顺叩

近社 弟钱鍾书敬上 十八日夜

此信大约写于一九八四年，当系初次通信。富君将书请周振甫先生转赠钱先生。钱先生后来在复信中赞为“功力深稳，足为整理古籍楷模”。

(二)

寿荪先生吟几：奉

手书并讽佳什。千辟万灌，而一唱三叹。如“落雁”“亡羊”、“老柳”“斜阳”、“疏柳”“寒云”诸联，苍阔婉挚，使事托兴，含凄善怨。才美遇屯，殆白傅所谓“天意君须会，人

间要好诗”者欤！虽

君自言为忍寒先生诗弟子，窃意就此事论，殊有出蓝之叹也。弟承先生不弃，书问殷勤，而迄未谋面。顷检旧稿，得酬先生诗两首，纸尾呈请

教正。语带讽谏，足窥当时世事人事，亦见“文章有神交有道”耳。勿此复谢，即颂

近祉 钱鍾书上 四月二日

得榆生先生金陵书并赠诗即答 一九四三年

絨泪书开未忍看，殷勤丧乱报平安。尘污共惜缁衣化，日暮遥知翠袖寒。负气身名随劫灭，吞声歌哭尽情难。意深墨浅何从写，要乞浮提沥血乾。

榆生先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

和去年秋夕见怀诗韵奉报 一九五四年

知有伤心写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见陆士衡《叹逝赋》。且借徐明邻壁语，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齏盐意已平。

龙先生翰札及诗笺皆于浩劫中失去矣。

这是富君以自己诗作函寄钱先生请益，钱先生复信加以赞扬。引诗出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至于信中例举“亡羊”、“老柳”诸联，盖出于富寿荪以下三诗。《三年》：三年过眼几沧桑，兀兀浑如梦一场。始信虚弦能落雁，空怜挟策待亡羊。灵修未醒钧天醉，大药难医举国狂。徙倚危栏风景异，浮云作阵蔽残阳。《襄阳公园抒怀》：梧叶飘残昨夜霜，小园风物乍苍凉。一坪饥雀喧衰草，几个游人倚曲廊。能写萧寥惟老柳，略分惆怅与斜阳。低徊意绪凭谁说，却对寒云忆渺茫。《暮秋抒怀》：一夕严霜朔气侵，闲庭景色转萧森。无

风疏柳还飘叶，不雨寒云亦作阴。浩劫惊呼从古少，神州忍见百年沉。撑胸何限忧危意，北望京华泪满襟。又，信中的忍寒先生，乃龙榆生别号。富君对龙先生很敬重，事事处处执弟子礼。龙先生对富君也是关怀备至，对其治学之严谨，尤加赞许。

(三)

寿荪先生吟几：尊诗拜读，方识遭际艰屯，故词旨凄惋；才命相妨，殆非妄说。作序事承

免役，题端不敢方命，遂冒佛头着秽之讥。倘不合用，嗤嗤撕作纸条儿便为大幸。忽忆一九五〇年龙榆翁寄诗，骚愁满纸。弟和答有云：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陆机《叹逝赋》；观大集名，告博一桀。即叩

暑安 弟钱鍾书上 十九日

此信写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富君为待刊的诗集《晚晴阁诗存》，请钱先生作序题签。今有油印本存世，共收诗作一百八十余首。封面由钱鍾书签署，并有赵冷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题辞、承名世绘“晚晴阁觅句图”的国画，以及富君照片一帧。此外有陈兼与、陈九思、施蛰存、钱仲联、苏渊雷、周采泉和徐定戡诸名家的序文及自撰跋文。

钱先生还为富寿荪选注、评解的《千首唐人绝句》题端。该书原名“唐人绝句评注”，与刘拜山合作，曾于一九八〇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一年后由富君单独负责，对选目、注释作了大量增订，并广辑旧评，补写新评，书名亦改用现名，特邀钱先生题署。富君在序言中特书“蒙王蘧常、钱鍾书先生题签，谨此致谢”。王蘧常的题签刊于里封。

(四)

寿荪先生文几：奉书惊喜。尊体康复，亦徵斯文未丧，吾道之幸也。承勘订拙著各节，感荷无既。万一再版，便当改正白石诗一则，拙著去年版 218 页已云：“即垂虹桥，参看《庆春宫》词小序”；李雁湖名亦已改误植“璧”字为“壁”字，并志嘉惠。大作诗稿，将讽咏观摩。第四年前大病入医院动手术，迄今疾患纠缠，每日不离药饵，稍一用心，即通宵不寐；又患白内障，几於废书不观；右拇指掣痛，作字维艰。作序之命，匪克负荷，尚乞

许其藏拙。尊诗自足名世，何待人序乎！草此复谢，即颂
近安 弟钱鍾书敬上 杨绛同候 五月廿三日

此信写于一九九〇年。富君去信为《宋诗选注》提出修改意见，钱先生复谢。

富寿荪君自学成才，又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晚年又受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笔者与富君多年同事，一度还同住单身宿舍，朝夕相处，深知其人温厚，有学者之风。富君不幸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突患脑溢血逝世于上海。我深感悲痛，特藉此文，寄托哀思。富寿荪的胞弟富铁耕、长女富英华、幼子富强提供钱先生信札的复印件并解答疑问，还得到富君挚友、同事倪丁元、杨友仁、承名世、温应时诸位的支持和帮助，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改定于虹口陋室东窗灯下

一九九〇年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发表的《钱鍾书先生在暨大》一文，近一年来已转载于《记钱鍾书先生》（大连出版社）、《写在钱鍾书边上》（文汇出版社）以及《暨南校友》校庆九十周年特刊上。钱师当年倾倒暨大同学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这里把一九七七年我收到的钱先生两封复信加以说明，使读者能看懂。

第一封复信写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信上说：

子清学兄教席：来信因未写“建国门内”，几无法投递，今晚始转到。得知

尊况，极慰。弟年来多病，挂名所中而已，健吾亦已一年餘未晤，闻亦衰病。古人诗云：“如期老至恰无差”，非虚语也。垂询一节，弟实不如何故，恐是定稿、通读时疏忽。弟已迁入国务院新宿舍，地址为“三里河南沙沟六栋二门六号”。匆复即颂

阖家安好 钱鍾书上 杨绛同候 十三夜

我写给钱先生信的底稿已遗失，只记得我向朱雯先生打听到钱鍾书先生和李健吾先生仍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随即写信给两位恩师，倾诉深切怀念之情。那时我在为刘伯承《回顾长征》一文的英译本做注释，文中有“He 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的句型。有人说“lead”（领导）只能用“lead somebody in doing something”的句型。我查阅《毛泽东选集》及其英译本，发现“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这个句子出现两次，一处用“in doing something”，另一处“to do something”的句型。我请问钱先生为什么同一个中文句子译成英文时要用两种句型，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有什么差别。钱先生说“实不知何故，恐是定稿、通读时疏忽”。钱先生虚怀若谷，令我感动。我反复诵

读这封信,感慨万千,复信请他善自珍摄,勿称我为兄。

第二封复信写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信上说:

子清同志:

来书奉悉。衰病之身,妄与群贤之列,甚觉惶悚,吾弟复加以奖饰,愈汗颜矣。垂询一句,原文乃极劣之英文;如当年吾弟作文中有此,兄必或改作“...are we albe to understand & predict...”或“can we understand & predict...”,前面之“in”亦以改“by”为较佳。报章及教科书中英文常有问題,不可迷信外国人;正如中国人写中文,不通者常有。此句之病,即修词学所谓“Redundancy”(A famous example: “They returned to the same city whence they had come forth”——A. Bain, *English Composition & Rhetoric*, Vol. I, p. 35; cf “一个孤僧独自归”)。因此尊译中“或许”二字必须删去。译者常因于文字把握不准,疑神疑鬼,于原文错误或毛病认为含有奥妙意义;文学翻译中更多此类(大文学家笔下不保无疵)。故必须眼光准,胆量大,千万不要拜倒在外国人写的英文面前。勿复不尽,即问近好!

朱雯先生前均候。

钱鍾书上 十三日

“妄与群贤之列”是针对我祝贺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说的。那时我在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做英语读物的注释工作。在注释“Oceanographers and Their Work”(海洋学家及其工作)一文时碰到这样两个句子:

The field of oceanography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ocean engineering and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1) physi-

cal, (2) chemical, (3) geological, and (4) biological. Only in studying all these fields of ocean science can we understand and be able to predict the ways of the sea and its creatures.

第一个句子简单明了,第二个句子就碰到麻烦。我开始认为“can we understand”是陈述语气,“be able to predict”是虚拟语气,故译作:只有研究海洋科学的所有这些领域,我们才能理解并且或许能预告海洋及其生物的习性。向钱先生请教以后我把“或许”二字去掉,但编辑同志不改动原文。原文仍然是个病句,必须照钱先生的意见修改,以去除“累赘”的毛病。为了说明“累赘”,钱先生举出一个英文例子,还举了一个中文诗句供我比较。他这样认真负责,令我铭感。钱先生这封信是用圆珠笔写的,一气呵成。“必须眼光准,胆量大,千万不要拜倒在外国人写的英文面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治学既要严谨,又要破除迷信,艺高才能胆大,胆大才能艺高。

不久我知道钱先生正忙于撰写巨著《管锥编》,就不再向他提问题了。我有幸亲炙这样一位先生,今后有生之年,自当竭尽绵薄,在翻译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于上海

郑土生

钱先生杨先生和《莎士比亚辞典》

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沙

莎士比亞辭典



此辭應命字上，以不合用，為由客氣，至囑
土生同志 錢穆呈上

一九八九年底,孙家琇先生写信告诉我:“河北人民出版社约我编一部《莎士比亚辞典》。你能否同我合作,当我的副主编?请尽快决定,我恭候佳音。”当时我正在撰写《莎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等论文,一下拿不定主意,便去请教一直关怀和培养我的恩师、长辈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二老说:“在我国莎学界中,孙家琇先生是最有学问的老先生之一;你应该同她合作,把这本《辞典》编好。”听了二老的意见,我才下决心,把自己的计划暂放一边,与另外二位副主编周培桐、石宗山一道,全力协助孙先生编好我国第一部中型《莎士比亚辞典》。

孙先生带病率领我们几个中年同志进入紧张的编写工作;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孙先生心脏病复发,进医院抢救。如果孙先生不能尽快出院,我们的计划肯定要泡汤。我想药物治疗靠大夫,我无能为力;心理治疗有时对心脏病却能收到意外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给孙先生送去快乐和欣喜呢?此事只好求助钱先生、杨先生了。于是我到书店买了一本《围城》,请钱先生题字签名,赠送给孙先生和巫宝三先生;同时又请杨先生、钱先生联名给孙先生写了慰问信。那时钱先生、杨先生都已进入高龄,也遭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二老长期带病工作,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要求他们给孙先生写慰问信,实在是太过分了。为了支持我们早日把辞典编出来,二老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过分要求。孙先生收到后,确实得到了“意外的惊喜”,精神大振,加上大夫、护士的精心治疗,很快康复出院,又投入紧张的编写工作。

一九九〇年十月,定稿工作基本结束。孙先生让我请钱先生题字。钱先生同我讲过,他给不少人的书题过字,以后不想再题了。我也知道,钱先生的右手有病痛;一写字,病痛就加

剧。我实在不愿意一再烦扰钱先生、杨先生，更不愿意给钱先生增加病痛。同时我也很希望钱先生能在我们的辞典上留下珍贵的墨宝，因为钱先生、杨先生都非常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学已经是风行全球的专门学问；在国内外学界中，钱学也正方兴未艾。如果钱先生能忍痛为《莎士比亚辞典》题字，不啻在钱学与莎学之间建立了一点联系，给后人提供一条历史见证。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孙先生来电话说：“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求求钱先生，这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只要你开口，钱先生会答应的。”

在孙先生的推动下，我只好硬着头皮，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大楼里给钱先生打电话。开始杨先生接电话。杨先生说：“钱先生早就讲过，不再题字了。现在钱先生的右手有毛病，一写字就痛；我看就算了罢，不必请钱先生写了。”杨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这次任务肯定完不成了。我想直接向钱先生再恳求一次，又不敢向杨先生提这个要求；当时我急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我和杨先生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突然，话筒里传来钱先生的声音：“土生，我早就下过决心，不再题字了，而且我的右手确实有病痛，不便写毛笔字。不过，你请我写，我一定要给你写的。”我如释重负，转忧为喜，连声道谢。钱先生接着说：“不用谢，不用谢，我们之间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就见外了！”

当天下午六点，我回到劲松九区宿舍时，钱先生已经把书名题好派司机送到楼门口等我了。司机说：“钱先生让我把这封信当面交您手里。”我再三道谢后，赶紧回家，拜读钱先生的信件，欣赏钱先生的题签，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